



第三章

未来十年全球和中美经济展望与挑战

迈克尔·斯彭思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摘要

发达国家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约50%。各国仍在苦苦挣扎，希望恢复其增长和就业的可持续模式。其中，美国经济进一步去杠杆化，经济开始增长，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就业情况仍然滞后。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在增长，有一定适应能力，即便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超低的大环境，发展中国家仍在某种程度上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

在供应方面变化迅速，逐步转向国内消费以及高回报投资并伴随着高附加值出口的发展模式，这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竞争以及市场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新一届领导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在于如何实施多项相应的改革措施，支持这一正在变化的发展模式。概括而言，中美两国都在未来十年面临重大、艰难的经济挑战。建立互助互惠的关系极有助于两国获得成功，并将惠及全球其他经济体。

未来十年全球和中美经济展望与挑战

一、导言

未来十年，全球及个别国家将出现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其速度和效果难以预料，也因此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008年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大量借债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债务有的来自私有部门（家庭、公司和金融机构），有的来自公共部门。这种增长方式还包括过度消费而投资不足以维持增长。部分国家金融部门行为失当和缺乏监管也助长了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最终，这种不健康的生长动力在2008年戛然而止。

我们正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降低债务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总需求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丧失了许多就业岗位。目前，去杠杆化尚未完成。总体

上看，私有部门债务持续下降，而政府部门债务则在上升。

美国和欧洲低利率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也有助于去杠杆化的实施，这些政策降低了高负债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加速了资产价格（包括房产价格）回升，从而改善了资产负债表，降低了财富缩水对消费产生的不良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储蓄者资本收入受损。此外，低息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借贷消费的模式上。

需求长期不振意味着经济增长还将低迷一段时间。在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向仍在增长的市场的出口。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种增长潜力只适用于经济的可贸易部门。最近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大约占全部产出的三分之一，在就业中所占比重略低于三分之一。不可贸易部门产值更大，而且完全依赖于



国内总需求。由此我们认为，过去4年多一直受到需求拖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欧洲（特别是欧元区）饱受上述因素困扰，再加上自身缺陷（形成货币同盟而没有形成财政和政治同盟），这导致欧元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和相关系统性风险时明显力不从心，在解决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以及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事实上，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处于负增长，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几个月。

最近，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系统重要性国家承诺实施财政稳定政策和经济改革，而以德国和其他欧元区核心国为后盾的欧洲央行则着手稳定主权债务市场（避免超额收益增加和信用风险出现危害性“自我实现”式上升），这缓解了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欧元区还承诺将于2013年实现银行系统稳定和统一监管的目标。

虽然情况得到了改善，但系统性风险仍然没有消除。实现稳定的过程尚不彻底，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财政稳定性措施也将进一步延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全面复苏。

发达国家依然占有全球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上述增长趋势说明，未来五年发达国家需求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创造内部需求才能实现高速增长。这与过去的情形完全不同。过去，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大，增长稳定，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供给、生产率、竞争力和结构转型等方面。虽然这些供给面的发展战略很重要，但目前如何创造足够的需求也成为关键。

由此，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扩张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趋势，这种规模扩张是由国民收入增长和需求快速转型造成的，还可以表现为全球中产阶级及其购买力的爆炸式增长。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制订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小型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同时也为

发达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可贸易部门提供了难得机遇。

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在可贸易部门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增长中获利，但当前，中国等主要国家的增长则主要依靠不可贸易部门的需求增长，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长期生产率和附加值增长。不可贸易部门增长是无法通过外部竞争推动的，只能依靠内部竞争、完善规章制度、增加人力资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等措施实现。

二、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¹

各种新技术和全球化正在深刻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教育层次的个人就业选择。技术创新不仅减少了常规就业岗位数量，也引起了全球供应链和网络的改变，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常规工作岗位以及存在各种技能要求的非常规工作岗位重新分配。这种强大的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它过去主要影响了发达经济体，而在不远的将来，将蔓延至发展中经济体。

技术海啸的核心是信息技术，摩尔定律、计算机和数据库标准化网络以及其他过去无法实现的服务大大推动了该技术的发展。技术分析师指出，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加速阶段，远未达到或接近终点。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上述趋势的强大推动力，以及相关数学概念。摩尔定律认为，半导体芯片中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如果换算成增长速度，接近60%。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增速达到10%，GDP每7年翻一番。我们知道这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技术增长速度比GDP增速高出6倍，这给过去三十年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廉价服务业规模的扩大。

¹ 译者注：该章节部分翻译参考《技术和就业挑战》，迈克尔·斯彭思，Project Syndicate，2013年1月15日，网址：<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upply-chains-on-the-move-by-michael-spence/chinese>

我们还知道，即使增速很高，其初始作用很小。30年前中国经济增速接近10%，但由于其经济总量较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7.5万亿美元。现在即使是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会与日俱增。这种影响同样适用于技术领域（但是以复杂的创新叠加的方式）。过去30年到现在，成本下降速度达到年均60%，使总成本降低了130万倍，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以下影响：生产自动化，常规就业岗位转移，构建复杂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从而获取人力资源。我们的重点是，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增长还将继续，而且会对经济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那么，决策者，特别是发达国家决策者，应该如何面对就业领域的挑战（以及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呢？我们可以从当前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关于经济结构的演化如何影响就业的有趣结论。

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至少已经有20年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就业增长了，即使创造了就业岗位，也集中在高收入、高学历层次，而中低收入和学历就业在减少。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伴随着制造业供应链中高就业部门的衰退。

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中低收入增长完全来自经济中的不可贸易部门，该部门大约要占发达国家产出和就业的三分之二。其中雇员人均收入和附加值几乎保持稳定。就业岗位可能因技术进步而削减，但不会因全球竞争而削减，而不可持续的债务推动型内需增长延迟了当前的就业赤字。

结果，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削减常规岗位，同时增加非常规岗位（比如仍无法用机器人和联网电脑取代和削减的岗位）。这使得教育和高水平技能的回报大增，发达国家资本所有者和高端雇员收入比重二十多年来持续增加。

于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和就业出现了分离。

这一趋势的关键推动力—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常规人力岗位被机器人和机器人取代是一个强大而持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制造业和物流业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电脑网络正在取代信息处理行业中常规的白领岗位。

这一趋势部分来自纯粹的自动化，另一部分则来自“脱媒化”，即银行、在线零售以及某些政府服务不再需要中介，而这里提到的只是少数领域。

但技术的影响并未到此为止。实现自动化、脱媒化和降低远程成本的信息技术同样使全球供应链和网络的构造更加复杂和地区多样化。

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和比较优势的变迁，全球供应链一直在转移。全球供应链能够将生产活动配置在人力和其他资源最具竞争力的地方。随着交易、合作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供应链中不仅包括中间产品和装配线，也包括越来越多的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维护和支持、客户服务、商业流程及其他。

其结果是全球供应链的“原子化”：将生产程序细致分割成为可能，提高了效率，几乎可以配置于任何地点。距离仍然是运输和物流成本方面需要考量的因素。但是，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构成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需求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符合生产逻辑的“原子化”生产过程将更具吸引力。

全球供应链、网络和服务的有效分解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全球经济的可贸易部门占经济的总比重增加，在该部门，经济活动和就业岗位是直接竞争。不仅是全球，对于个别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其次，全球供应链中无竞争力的部分将不再会因为毗邻高竞争力部分而得到保护。临近性不再是一项必要条件。

这些动态以及相关挑战并不只是发达国家才需要面对。比如，在未来十年，中国将以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取代大量劳动密集型



装配岗位，不但在可贸易部门是如此，在快速增长的不可贸易部门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动化和叠加式制造业领域的扩张，以及成本的下降将影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位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适应这些趋势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投资。对发达国家个人、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来说，在教育和技能领域宽基础、大手笔、高效率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填补技能市场的信息空白也将增加这类投资的效率。但是，由于公共部门投资不足，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结构调整迟缓的问题将继续存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发达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财政实力或者意愿，在短期内扭转这种趋势。危机已经影响到个人收入，而以追求长期可持续增长为目的的扩大投资将进一步打击中短期消费。虽然有可能实现扩大投资，但在当前阶段，政治因素似乎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在危机和需求下滑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基本趋势将带来多重影响。失业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中，收入分配问题恶化，大部分财富将流入资本所有者或人力资本拥有者手中。这导致了恶性循环，即上层收入者积累了更多物质和人力资本，而更高的资本份额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收入。各国往往通过税收体系，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亦或国有化（例如中国）来避免这种趋势恶化。少数国家通过成功实施技能发展计划，在全球供应链的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由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不良趋势已经威胁到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功能。政府应出台果断措施遏制这种趋势发展，而不应陷入政治僵局和无休止的纷争辩解之中。这种不稳定性还对投资和复苏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过去4-5年里，解决政府投资赤字问题的相关重要改革受到阻碍或延迟，这已经对政府的财政灵活性造成广泛而严重的损害。

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技术基础和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变化速度令人感到困惑和新奇，理解和应对仍需时日，至少从目前看来，我们的应对措施落后于其变化速度。

三、中国和中等收入转型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阶段，有时也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称之为“陷阱”，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大幅放缓，很多历史数据都支持这个论断。

中等收入转型涉及到一个经济体中，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紧扣结构调整的主题，其中包括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从而带动家庭需求和消费增长。投资仍将保持稳健增长，但公共政策更趋合理，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竞争和治理、改善市场环境、发展金融产业、减少不平衡、加大对经济供给端资金支持等措施，减少回报率低的公共投资项目。城镇化将扩大和吸收农村地区劳动力，大量资金将投入到相关基础设施（运输、水力、污水处理系统、电信、当然还有电力）建设，以及住宅和商用房地产开发中。

这个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经济中不可贸易部门效率得到提升，原因是该部门规模扩大，更加重要，而且不存在国际竞争。当然，如果政策允许，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不可贸易部门（例如雀巢和家乐福进入食品领域，以及其他一些外资企业进入建筑、酒店和金融领域），这是政策选择问题。

另外，创新也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具有全球共享性，创意、知识和技术可以相对自由地跨境流动。中国的自主创新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分析家和决策者对西方国家的宏观金

融管理和监管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担心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失衡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政府成功应对危机，开展逆周期需求调控，推动结构调整和解决收入分配等措施。随着中国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完善，我们期望中国不会减持公共财产。因此，中国将面临如何管理好公共财产的挑战，以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合理怀疑，不应该延伸到动态创新等微观领域。就像上面提到的，创新是目前中国发展阶段首要任务。创新型生态系统一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实际和潜在竞争。这促使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在产品、服务和节约成本方面不断创新，成功地创新可以使企业在短期内获得市场支配力。虽然各地区情况不同，但这种模式已经获得充分理解，而目前确实没有其他路径可循。为企业在竞争、市场准入、资金、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创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将成为未来机制和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的经济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社会基本服务和保障分配不公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and 促进增长，还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腐败和保障投资市场机会均等也能够为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助力。

为了完成主要的结构调整，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目前普遍认为，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多次关键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辉煌，经济走向成熟，规模不断扩大和深化。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正确观点是，只有继续加快和深化改革，中国才能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赖以成功的模式已经进入尾声。未来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倚重包括消费需求在内的内部需求，并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市场化比重。

针对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前社会议论纷纷，中国内部需要协调处理好不同意见，为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做好准备。随着国家日渐富裕，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会产生强大的特权阶层，而政治和政策则需要合理地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大众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尚未能通过有效途径充分表达意愿的群体的利益，应当优先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新一届领导集体成功过渡的阶段。当前的领导人参与了“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准备工作。它是一个全面的路线图，如果改革政策措施能够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并顺利实施，则必将成功。然而，我们要知道，过去成功和快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很少，而像中国这样规模国家的成功案例更是绝无仅有。而且，过去的成功都伴随着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那时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比重较大且不断增长，但现在全球经济则呈现出较大的阻力和风险。

此外，与其他经历过此过程的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系统重要性在增加，但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模式影响了全球原材料、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也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秩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因此，与过去不同，未来十年，中国不但要为自身的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角色转型领航，也需要平衡其政策的内部动态性和外部影响。假以时日，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加强。

多数人认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中美两个全球最重要国家的政策措施，取决于两国是否能够通力合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创建稳定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方面发挥领袖作用。欧洲将继续缓慢复苏，未来也许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以更加适当和团结（而不是分散）的方式参与全球事务。如果这种情况



出现，统一治理下的欧洲将成为中美两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领导和适应全球变化，但短期内这并不会实现。

四、合作

中美两国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自然资源和环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点。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翻一番，之后再过十五年将达到目前规模的三倍。届时，过去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气候、食物、水、能源和居住条件将无法承担过大压力。事实上，各国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新的增长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对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担心，责任感增强，价值观转变，这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快和提高这种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两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庞大，意味着两国必须去适应这种变化。两国的参与程度为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直接动力。当前的全球问题错综复杂，而中美在能源安全高效、绿色增长、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好开端。

目前各国纷纷致力于解决能源问题。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也在该领域提出了宏伟目标。尽管规划中仍有国家管控性措施，例如汽车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但相对于美国，中国的政策在降低中央集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美国希望通过发展页岩油和页岩气，未来能够成为能源独立国家，而使用天然气也可以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实际上，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升。我们可以将过去的发展简单地概括为：美国给中国带来了开放的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同时本身也获得了充沛的劳动力

资源，从而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现代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为关键制造业部门提供了劳动密集型生产部件。现在，这个过程正在改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过去中国消费者无力消费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这也有助于中国吸收先进技术。可贸易部门中低附加值的就业岗位将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就业岗位在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较低，但受到人力节约型技术的影响很大。中国将对美国经济中很多领域进行对外投资，其中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尽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正在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但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提供、分享和吸收先进技术和人才，也将继续巩固其全球顶尖教育和基础研究中心的地位。

当然，两国也存在良性竞争。过去二十年间，两国的比较优势差距正在缩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来十年中国还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从收入、资本深度（包括人力资本和能力）方面看，这种差异正在缩小。与过去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跨国企业知名品牌将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将与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竞争，成为全球供应链架构的设计者。我们要看到，他们将在全球与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良性竞争是在公平和规则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全球经济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不是零和游戏，每个参与者都有足够的空间成为游戏中的强者。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全球供应链和网络架构转型。过去，大体上讲，全球供应链由东方向西方转移，更精确地说，是通过东方向西方最终需求端转移。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过去，需求和增长，即使是绝对量的增长，也将不再集中在西方国家。

另外，还有一种潜在力量，使过去“非本土化”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开始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本土化”主要表现在能源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比例下降，定制产量增

加，由周期性大批量订单向订单即时更新和供应链调度管理方面转变，以顺应客户采购行为的实时变化。这促使企业推行“本土化”生产。过去几年，这种趋势使得很多供应链关键部分迁回发达国家，而从现在和未来情况看，生产将向企业各自的市场转移，其中也包括发展中国家。

五、人口老龄化

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处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各国老龄化程度不同，日本最为严重，其次是欧洲国家，然后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未来的移民政策尚存疑问，如果按照过去的趋势，移民将延缓美国的老龄化进程。

伴随着大量公共债务和非债务性负债（美国说法是权益）的老龄化将给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医疗）造成严重问题。中国需要面对如何精确计算老龄化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的负债问题，以及如何限制这些问题。发达国家的例子应该引起警惕。

总体上讲，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在寿命和工作年龄上的假设和参数已经不再适用。政府需要改造这个系统，但这个过程将非常艰难，部分原因是老年人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决定生活方式，操之过急的做法在政治上不可行，也不公平，但大量的长期负债会恶化长期财政失衡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专家们认识到，在现行系统中进行较小改动，将会对解决长期负债问题大有裨益。

毫无疑问，为了适应新形势，个人储蓄行为也要作出改变。可以通过改造社会保障系统来适当刺激储蓄，而合理的退休政策也能够增强人们的适应能力。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工作年龄需要延长，但这又给企业如何支持员工在工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实现转型带来了问题。

这些问题与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技术驱动型就业有关。公平地讲，在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技

术和人口环境转变过程中，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也许工作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将成为转变过程的一部分。

六、发展中国家的韧性

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前面讲过，这是发展中经济体规模扩大、收入上升、贸易增加（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以及需求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流向发达国家最终需求端的贸易比重将越来越小。

这种持续增强的反弹势头仍将继续，但发展中国家仍旧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全球需求的很大比重依然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例如当前欧洲国家）增长大幅下滑将在中短期内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

七、中美和全球经济预测总结

上文中我们看到，未来十年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结构和政策向着更健康 and 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中国结构调整的轮廓已经相对清晰，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政策和制度发展付诸实施。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职后，将进一步明确并正式宣布优先改革的措施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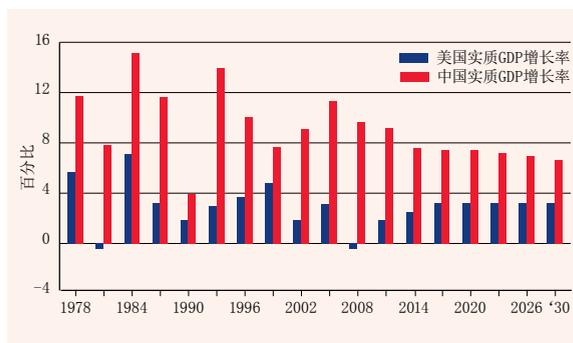
美国经济富有活力和灵活性。目前经济正在复苏，而且复苏势头很可能延续下去。去杠杆化的实施、能源领域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升都加速了经济复苏。然而，总需求不足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而对于庞大的不可贸易部门，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此外，在需求和投资领域进行逆周期的财政操作，却因财政灵活性大不如前而受到限制。

美联储之前宣布，将使用货币政策降低资产负债表受损造成的影响，通过提高资产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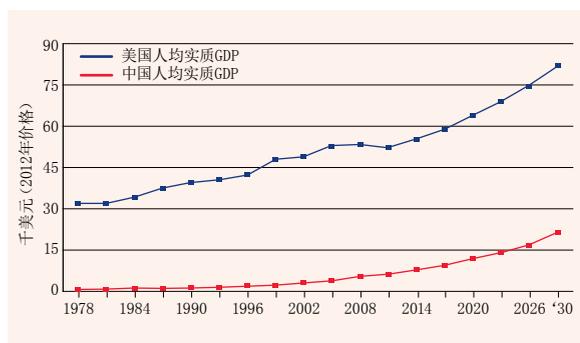
图表1: 中美两国实质GDP的实际值和预测值(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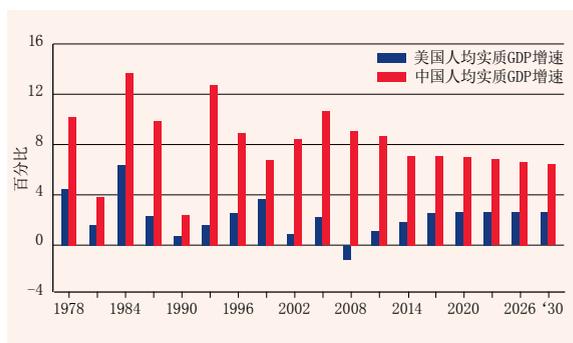
图表2: 中美两国实质GDP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图表3: 中美两国人均实质GDP的实际值和预测值(千美元)



图表4: 中美两国人均实质GDP增速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和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但政治两极化加大了政策的不可预见性。很多中立议员认为,可信的短期刺激政策,加上中期赤字削减计划,以及降低长期负债的组合措施是最优的政策选择(特别是考虑到削减赤字能够保障增长导向型公共投资),但是,从目前的政治环境看很难实现。

尽管经济的实际增长正在缓慢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但就业复苏乏力和收入分配转移带来了更多问题。收入从储蓄较少的人群向储蓄较高的人群转移,会对总需求复苏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供给面的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但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受需求制约也是共识。

欧洲复苏进程将非常迟缓,同时存在下行风险。去杠杆化过程缓慢,亟需各成员国(特别是核心国)共同出台协调和补充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协调政策的潜在挑战主要

是如何分担责任,谁将承担经济再平衡带来的成本,承担多少。

按照目前趋势,美国经济将缓慢和稳健复苏,从国际上看,趋同的过程仍将继续。到2015年,整个东亚地区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其中中国占有很大比重。预计约16年后(也就是2028年),中国实际GDP将超过美国,届时中美两国实际GDP均超过25万亿美元(2012年价格),是当前中国GDP的三倍。当然,这个结果也可能更快发生(美国经济也在增长,但增速低于中国经济)。到那时,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将分别占到全球产出的15%。

中国人口总量估计在2045年达到均衡水平,此后基本保持稳定。有的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顶峰,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在2035年前放宽人口政策。

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预计达到19,960美元,仅稍高于美国人均GDP(76,750美元)的四分之一。

八、面对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和增长挑战时,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比过去更加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双边互利,也为两国解决争执和摩擦提供了合作途径。此外,在全球经济结构和合作方面,世界其他国家也要仰仗中美的领袖作用。贸易开放、金融稳定和规范、能源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集中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想成功实现全球再平衡和进步,不可能缺少中国或美国的参与。



附录 1

美国国会预算局：经济预测

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至2023年经济预测					
	估算	预测		预计年平均	
	2012	2013	2014	2015-2018	2019-2023
第四季与第四季同比(百分比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	1.9	1.4	3.4	3.6	2.2
名义	3.7	2.9	5.3	5.7	4.3
通货膨胀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1.5	1.3	1.8	1.9	2.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a	1.5	1.5	1.9	2.0	2.0
消费价格指数 ^b	1.9c	1.5	2.0	2.2	2.3
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b	1.9c	1.8	2.0	2.2	2.3
价格指数	1.8	1.5	1.9	2.1	2.0
雇佣成本指数 ^d	1.9	2.2	3.3	4.0	3.6
第四季水平(百分比)					
失业率	7.8c	8.0	7.6	5.5e	5.2f
与上年同比(百分比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	2.3	1.4	2.6	3.7	2.3
名义	4.1	2.9	4.4	5.9	4.3
通货膨胀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1.7	1.3	1.7	1.9	2.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a	1.7	1.3	1.8	2.0	2.0
消费价格指数 ^b	2.1c	1.6	1.9	2.2	2.3
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b	2.1c	1.7	2.0	2.2	2.3
价格指数	1.8	1.5	1.8	2.1	2.0
雇佣成本指数 ^d	1.8	2.1	2.9	4.0	3.6
历年平均					
失业率(百分比)	8.1c	7.9	7.8	6.1	5.4
就业人口(月度变化,以千计)	157c	105	182	171	75
利率(百分比)					
三个月期国库券	0.1c	0.1	0.2	2.2	4.0
十年期国库券	1.8c	2.1	2.7	4.5	5.2
税基(占GDP百分比)					
工资薪金	44.1	43.5	43.9	44.2	44.9
国内经济利润	9.6	9.3	9.7	9.7	7.7

此处的数据并不反映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于1月30日发布的GDP和相关数据值,以及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于1月31日发布的雇佣成本指数和2月1日发布的就业人口数据值。

a.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

b. 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价格指数。

c. 2012年实际值。

d. 私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的雇佣成本指数。

e. 2018年数值。

f. 2023年数值。

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的实际值来自劳工部、劳工统计局;联储局)

附录 2

非正统的中美GDP预测比较

图1: 2022年非正统美国GDP水平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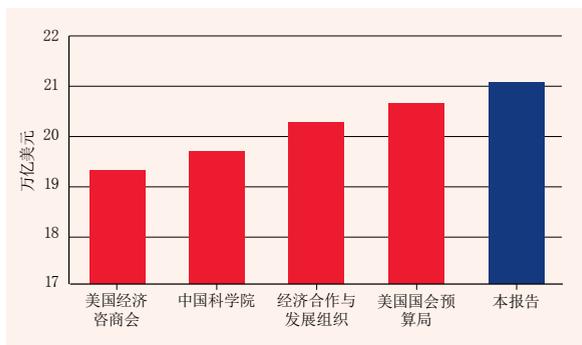


图2: 2012年-2022年美国年复合实际增长率的非正统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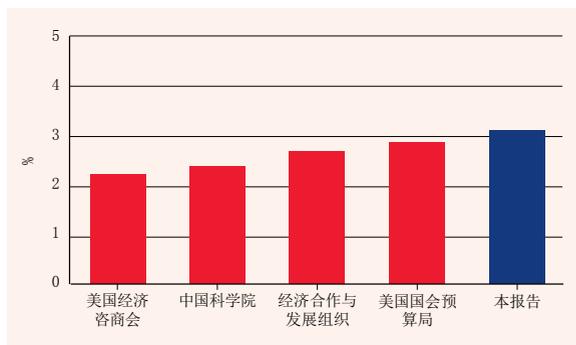


图3: 2022年中国GDP水平的非正统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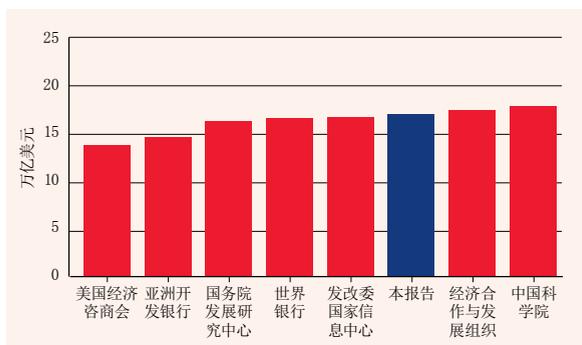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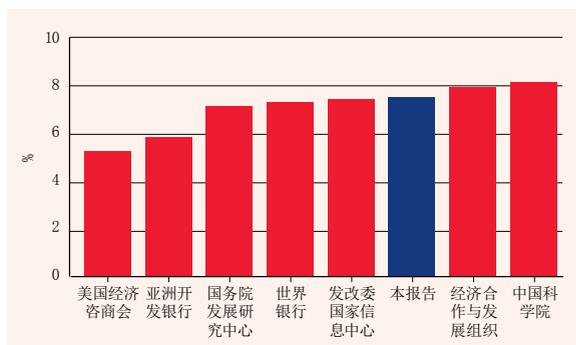


图4: 2012年-2022年中国年复合实际增长率的非正统预测



资料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GDP和贸易长期预测”, 亚洲开发银行, 2011,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ions-gdp-trade.pdf>
 中国科学院陈锡康(2013), 中国科学院, 将要发布
 美国经济咨商会 (The Conference Board),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globaloutlook.cfm>, 2013
 美国国会预算局, <http://www.cbo.gov/publication/43902>, 20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年展望: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新发展阶段的开始”, 2013年中国发展论坛会议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9742#>
 国家信息中心,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未发表的预测报告, 2012年
 世界银行, 《2030年的中国》, 世界银行, 2012年,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参考文献:

Kathryn J Byun 和 Christopher Frey, “2020年的美国经济: 不确定时代的复苏” (The US Economy in 2020: Recovery in uncertain times), 《每月劳工评论》, 2012年1月。
 James Manyika, David Hunt, Scott Nyquist, Jaana Remes, Vikram Malhotra, Lenny Mendonca, Byron Auguste和Samantha Test,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更新: 重组美国经济引擎” (Growth and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ooling America's Economic Engine),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1年2月。
 迈克尔·斯彭思, “后危机时代世界的风险” (A Post-Crisis World of Risk), Project Syndicate, 2011年6月15日。
 迈克尔·斯彭思, “全球经济增长背后的残酷事实” (Hard Truths About Global Growth), Project Syndicate, 14 September, 2012年9月14日。
 迈克尔·斯彭思, “新兴市场弹性” (Emerging-Market Resilience), Project Syndicate, 2012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十二五”规划》, 2011年3月。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展望。
 美国国会预算局, “预算和经济展望更新: 2012至2023财年”, 2013年2月。